

日 本 经 济 史

1

经济社会的成立

17-18世纪

〔日〕速水融 宫本又郎 编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日本經濟史

1

经济社会的成立

17-18世紀

〔日〕 渡中誠 渡中友雄 編

出版・發售・郵政・印刷局

日本经济史

1

经济社会的成立

17-18世纪

〔日〕速水融 宫本又郎 编

厉以平 监译

厉以平 连湘 译 金相春 译 经思平 校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经济史 1: 经济社会的成立 17-18 世纪/
(日) 速水融, (日) 宫本又郎编; 厉以平等译. - 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11
ISBN 7-108-01098-4

I. 日… II. ①速… ②宫… ③厉… III. 经济史-日本
IV. F13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8670 号

本书据日本岩波书店 1989 年 1 月 21 日第 2 次印刷发行的版本翻译出版。本书的翻译出版, 得到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赞助

责任编辑 胡 靖
封面设计 罗 洪
版式设计 赵学兰 姜仕依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11.25 印张 247,000 字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册

ISBN 7-108-01098-4/F·74 定价 30.00 元

Keizai Shakai no Seiritsu (Nihon keizai - shi, Vol. 1)

ed. by Akira Hayami and Matao Miyamoto

Copyright © 1988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ese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in 1988.

《日本经济史》编辑委员

梅村又次	新保 博
中村隆英	西川俊作
速水 融	安场保吉
阿部武司	猪木武德
尾高煌之助	斋藤 修
宫本又郎	山本有造

《日本经济史》与新经济史学

——代监译序

厉以平

1988年11月至1990年2月，岩波书店陆续出版了由梅村又次、新保博、速水融、西川俊作等撰著编辑的8卷本《日本经济史》，可以说这是日本数量经济史亦即新经济史学已经臻于成熟的重要标志。8卷本问世后，日本学术评论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这部经济史“代表当今数量经济史的水准”，提出了“众多值得注意的论点”。^①对于这样一部起自近世终止当代、纵贯近四百年的多卷本经济史所涉及的广泛内容和具体问题，无疑将有待于通过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来进行检讨和评论。这不是本文的任务。作为监译者，这里想仅围绕8卷本所代表的新经济史学在日本成长过程中的有关情况作一简要的回顾与介绍。

8卷本虽冠以“日本经济史”的书名，但并不是一部日本经济通史，它考察的仅仅是日本近世以来迄止当代不到四百年的经济发展历程。然而这四百年却是日本历史上内容最丰富、变革最剧烈的一个阶段。编著者们将自己的考察限定在

^① 东条由纪彦：《书评：日本经济史1、2、3》，收入《社会经济史学》，第57卷，第4期，1991年10月。

这四百年，当然不仅由于这一缘故。更深层的原因是基于他们多年对近世所作的系统深入的研究，揭示了日本前近代社会与近代社会的内在联系，令人信服地将近世、近代和当代当作连贯继起的一个整体来把握，即把近世作为日本工业化创造前提条件的阶段，近代作为工业化阶段，当代作为工业化以后的经济成长阶段来看待。这种整体考察和连贯把握的意义，不止在编纂体例上的创新，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实现了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的统一。新经济史学正是经济史与经济学的统一。在日本，经济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历来是畛域分明的。以明治为分水岭，“近世”经济史与“近代”经济研究之间存在着某种分工，经济史被归入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这表明经济史与经济学实际上是割裂的。而存在已久的这种相互封闭的割裂状况，直到 60 年代才由日本“新”经济史学家应用数量数据和数量分析进行的研究打破。

新经济史学在日本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由于人口史、价格史和经济增长研究这三个领域可利用的数量数据相对丰富，部分经济史学家首先开始在这三个领域尝试“从数量上接近”经济史。^①到了 70 年代初期，“数量经济史研究会”宣告成立，集结起一批有志于打破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的樊篱，试图赋予日本从近世至近代经济发展以重新解释的经济史学家，擅长经济发展理论的经济学家，以及少数历史地理学家和政治史的研究者，应用数量数据和统计数量分析，深入开掘，共同探研，陆续出版了多集《数量经济史论集》以

^① 西川俊作：《经济史上新的接近》，收入《现代经济季刊》，1982 年春季，第 47 期。

及数十部颇有建树的新经济史学专著^①。在长期研究探索的基础上，80年代末期终于奉献出8卷本《日本经济史》这一新经济史学的集大成作。

8卷本《日本经济史》作为日本新经济史学的一部力作，最突出之点，或许可以认为是它体现了日本新经济史学家所信守的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相结合的理念，实践了将近世和近代作为工业化过程中连贯继起的整体来把握的学术主张。在日本社会经济史学界，传统的看法认为17世纪以后的德川经济本质上是黯淡的，民众在苛重的税负、商业化、凶作绝收和豪农盘剥下苦苦挣扎。17世纪经济虽有所成长，但在德川时代最后一个半世纪由于幕藩体制赖以存在的“本百姓”体制的基础削弱而使经济陷于停滞。总之在野村兼太郎的《日本经济史》、儿玉幸多的《近世农民生活史》、高桥龟吉的《日本近代经济形成史》，以及其它许多作者的论著中，“停滞”似乎成了最常见的用语。不仅经济史学家，理论经济学家也是这样看待日本前工业化社会的经济的。大川一司的看法可以作为代表。他在《日本经济分析：成长与结构》中指出，“日本资本主义化的初期条件看来似乎处于停滞状态”。所谓“初期停滞”是指实质工资接近于生存水平的最低限度，使用的技术停留在机械化可能的最低水平，超过必要最低实质工资的生产物剩余被全部消费，没有投资可言。美国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的理查德·纳尔逊教授进一步提出了德川经济发展模型。他认为德川时代最初一个世纪是比较繁荣的时代，

^① 《数量经济史论集 1·日本经济的发展·序言》，数量经济史研究会编，1976年。

经历了战国时代的战乱和农业歉收，迎来了和平和丰收。然而到 17 世纪末未开垦地已几乎消失，在灌溉和肥料方面也没有大的投资，新田开发困难。与此同时，农民每人所得也渐渐降到生存水平以下，终于在 1725 年前后日本人口增长停止。农民为了缩小家族规模，人为地限制人口增长，此外饥饿、疾病也是人口增长停滞的原因。技术水平低、储蓄倾向小，完全陷入了“低水平均衡陷阱”，在 150 年间资本、所得、人口均几乎没有增加。直到 1867 年障碍才得以打破，明治时期总所得和人均所得开始急速增长，日本挣脱了“低水平均衡陷阱”。^①可以说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经济学界在 6、70 年代一般都认为在日本前工业化的近世与工业化的近代之间横亘着一道裂谷，两者是不相连续的。库兹涅茨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现代经济增长有许多是旧有的长期发展趋势的继续，不过采取了大大加速的形式，这种连续性很重要，使许多发达国家在它们的现代增长和工业化开始以前比世界上其它国家要先进很多，使它们享有现代增长开始之前的长期发展趋势所带来的相对有利地位。不过，他指出日本除外，不属于有连续性的国家。^②

8 卷本的编撰者们，在 20 年前开始其新探索前面对的就是这种经济史与经济理论断裂、日本近世与近代经济发展不相连续的传统偏见占主导地位的局面。然而这毕竟

① 参见理查德·纳尔逊《不发达经济中的低水平均衡陷阱》，收入《美国经济评论》，1956 年，12 月号；同作者：《增长模型和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日本的范例》，收入《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第 8 卷，第 2 号，1960 年。

② 参见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的增长：发展和反映》，收入《美国经济评论》，1972 年 6 月号。

是事实的一个方面。这期间由于不发达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史观的创新、数量方法的应用以及美国的日本学对近世采取的新视角，日本社会经济史学界终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于1957年出版的《经济理论和发达地区》，是这个时期西方理论界试图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局部理论，重建一般理论，吸收非经济要素并将其与经济要素结合起来同现实问题一道加以反省的不发达经济学的代表作。他指出经济发展是整个社会文化上升发展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影响发展的因素既有产量和收入，也有生产条件、生活水平、对待工作和生活的态度以及制度政策等。此外，同一时期哈佛大学的格申克龙教授的“工业化类型”论所持的经济成长“多途径”观点，也明显不同于罗斯托的“成长阶段”论所主张的西欧资本主义各国工业化单一途径的观点。而这期间问世的霍森利茨的《经济增长的社会学方面》（1960年）、赫希曼的《经济发展战略》（1961年）等著作，则把日本从19世纪中叶起几乎不靠外力独自发展成功的经济，视为应用不发达国家一般开发理论进行综合地域研究的最佳对象。日本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者重新认识本国的工业化前提条件和成长道路时，从中受到了启发。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西方新经济史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影响。经济成长史学渊源于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传统，其理论基础是马歇尔经济学的有机体原理和连续性原理。马歇尔认为经济和社会如同生物有机体一样，是随着岁月一道成长的。社会进化没有突然的变异，经济成长是合理性手段累积

应用的结果，无例外地呈自然连续型式。马歇尔一派的学者基于连续论的立场，将产业革命的内容模糊化，从而诱发了将产业革命的开始期上溯到比1760年更早的见解。稍后，诺思进而从所有权的角度，得出产业革命的起源应回溯到传统年代以前，产业革命是一系列往事的渐进性累积而非习惯所认为的那种与过去的根本决裂的论断。

60年代末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一书问世，随即由新保博译成日文，成为日本治经济史的学者经常引用的经典性文献。希克斯在该书中提出的“市场经济史观”，把经济史的内容概括成市场经济由简单到复杂、由初级到高级，市场经济制度由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人”为创造这种或那种经济制度起了关键作用。关于市场经济的特点，希克斯认为是由专门的商人来从事交易活动，商业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经济，依赖于外界才能存在，商业离不开市场。从世界范围看，希克斯把15—16世纪看成是市场经济扩大的时期，这时市场的力量开始渗入农村，使农村经济商品化，并出现了劳动力市场。政府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经济立法逐渐完备，政府对商人的财产和契约进行保护，政府也日益把来自商业的税收当成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作为著名的理论经济学家，希克斯将市场分析和市场经济概念应用到历史上的经济发展之中是有开创意义和广泛影响的。在此之前，国际经济学界对市场本质和市场的组织功能既缺乏深刻认识，也未曾进行过理论分析。1968年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竟然连关于市场这一现代经济的最重要的制度及其

经济绩效的论文都付之阙如。至于经济史界，占主导地位的波拉尼的观点则坚持认为，在18世纪以前的社会，主要依赖互惠和再分配来行使资源配置功能，市场成为主导的资源配置制度不过是19世纪的现象，也仅存在于西方世界。日本新经济史学者对江户时代市场结构和机制的分析，关于“经济人”的命题显然摆脱了传统经济史观而接受了希克斯经济史观的影响。

在日本新经济史学成长历程中，诺思的“制度经济史学理论”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从60年代后期起，诺思逐渐转向纯经济问题背后的制度和组织因素的分析。他不满意于以往经济成长史学依附于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新古典经济理论应用于经济史学有两大缺陷，一是其目的不在于解释长期的经济变化，二是它提供的答案往往有很大的局限性。为了弥补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不足，诺思及其合作者创建了适合于研究课题和特定时期具体事例的模式。1971年他与戴维斯合作出版了《制度变迁和美国经济增长》，1973年他与托马斯合作出版了《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他在这期间的研究都围绕着这样一个重要命题展开，即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其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为突出，无论封建庄园制度的兴衰还是近代产业革命的发生，都与私人财产地位的变迁有直接的关系。诺思从制度因素和组织变迁着眼，在经济史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示性的论点。如认为9世纪西欧推行的三圃制与人口增长有关，是当人口增长导致劳动报酬递减时才成为一种更好的组织形式，三圃制是经济上对土地与劳动比率变动的一种合理的反应，是对相对要素价格变动的一种适应，而不是单纯的技术上的变革。三圃制可以看

作是整个西欧人口密度提高的结果。^①又如，认为第一次经济革命从狩猎业向农业的过渡，是从财产共有到私有的转变，本质上是所有制的革命。这场革命发生的制约条件在于，当动植物相对于人类人口的需求仍然充裕时，是没有动力能够刺激人们为建立对它们的所有权而付出成本的，只有当稀缺性愈益严重，必须对资源利用的速度加以限制时，才值得为建立和实施所有制而付出代价。关于中世纪庄园制度和劳役，诺思的看法更是精辟之至。比如他指出，庄园的有效规模决定于提供保护的边际成本，等于领主在边际劳动产品中所占份额的价值即税金。又如他指出，封建主义的所有权实际上是一种土地使用权的有条件的转让，而得到的回报则为兵役；劳役是在没有专业化和交换时形成有组织的市场需要极高的交易费的一种结果，等等。《西方世界的兴起》英文版问世不久，即由速水融等译成日文介绍到日本。日本新经济史学应用交易费用方法解释近世诸如米市场形成等经济史现象，采用人口与土地比率的框架并将价格和相对价格的变动贯穿于全部经济史的考察，以及从制度和组织变迁方面探寻经济成长的原因等，都可以看出诺思的制度经济史学理论的影响。

日本数量经济史即新经济史学具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不同于美国数量经济史研究中往往更偏重于依靠理论来进行计量，运用理论来解决数据不足，或把原始数据重组成符合严格定义的经济概念结构的做法，而是更接近于从 60 年代起风行于欧洲的历史人口学和价格史研究中的数量方法。新保

^① 参见诺思和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8 年，第 45—47 页。

博在介绍他在《近世物价与经济发展》一书中采用的方法时指出，日本学者尝试的数量经济史的接近，未必是那种美国式的数量经济史的方法，因为新古典派经济理论，国民经济核算框架是否可能适用于江户时代那种前工业化社会是有问题的，即便有相当的适用的可能，就江户时代而言要把这种接近所必需的数量数据搞到手也极其困难。因此这种接近的方法充其量只是广义的数量经济史，不过是将江户时代可以搞到手的数量数据加以收集、整理、分析，按一定的理论框架尝试对其作出解释。

50至60年代在欧洲学术界，历史的数量研究在人口史和价格史领域已成果斐然。历史人口学的诞生是20世纪50年代人口史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创新，法国国立人口学研究所亨利为中心的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被认为是新学科取代传统的人口史的标志。亨利在对日内瓦上层市民的人口学观察中，以1550—1899年期间的系谱作为人口资料，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即“家族复原法”。这种方法以一对夫妇为单位，编制卡片，记载夫妇结婚生育、子女结婚、死亡等情况，然后进行统计处理。稍后亨利与高尤蒂合作，利用法国诺曼底的库尼埃莱教区的教区簿册，进行了详细的人口学分析。教区簿册是教会按时间顺序记录教民受洗、结婚、埋葬的一种年代记，载有举行仪式的种类、时间、有关人的姓名，有时也表明职业。于是以往几乎不可能引起注意的一般平民百姓的具有人口学意义的行为便可以观察分析，从而可以得出近代调查开发前关于出生、死亡、结婚等详细而可信用度高的统计资料。法国人口学者对人口统计资料的开发和在统计方法上的创新，对日本新经济史学者显然具有示范意义。

此外，在人口史领域，出现了不少论述人口增减与经济波动关系的经典性文献。如贝洛奇关于古罗马以来意大利人口的研究，雷塞尔关于中世纪欧洲特别是英国人口史的研究业绩，格里菲思关于英国产业革命时期人口的著作等。尤其是英国产业革命时期人口增长，主要是由于出生率提高还是死亡率下降这一争论，与产业革命的乐观论、悲观论纠结在一起，一时风靡了西方学术界，同样也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关注。^①日本新经济史学家、历史人口学家速水融教授在与宇泽弘文关于“经济史的新的接近”的对话中，回顾了欧洲这股学术新思潮和新方法带给他的感受。当时他正着手“太阁检地”的研究，对江户时代初期农政史、土地制度史颇为关心。而这时围绕“太阁检地”掀起的激烈争论，由于本身是按照传统教义关于日本封建制、农奴制这一概念的历史解释线索进行并以此为前提来讨论的，不从日本的事实出发，结论先于研究即已做出，因而陷入了困境。一批像速水融这样的学者不满意这种状况，思考着如何亲手把日本过去的经济社会重新发掘并加以构建。速水融本人当时游学欧洲，寻求出路。他在荷兰肯特大学访问期间接触到历史人口学，开始酝酿将这一方法运用到日本的史料之中，利用日本的“宗门改帐”来开展历史人口学研究。这期间他译述了著名荷兰学者斯利彻·范·巴思的《西欧农业发达史》。这是一部应用数量史方法论述西欧从中世到19世纪发展的名著，该书不仅方法新颖，而且突破了陈说，摒弃了以往经济史沿用的发展阶段论

^① 参见琴野孝：《英国产业革命与人口史研究》，收入《经济史上的人口》，社会经济史学会编，1969年。

和其它传统的学说。速水融译介此书，也是为了借鉴数量经济史的方法，以便利用日本的资料开展新社会经济史的研究。^①

20 世纪 60 年代是日本物价史研究收获颇丰的时代。这期间出版了由京都大学近世物价史研究会与大阪大学物价史研究会等收集的物价史资料，同时梅村又次、新保博、山崎隆三、岩桥胜、宫本又郎、斋藤修等出版了值得注意的物价史论著。应当看到，日本物价史研究的进展是在西方物价史研究的影响下取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学界出现了两大新动向，即由短期分析向长期分析变化，由质的分析向量的分析变化。经济学家从短期分析转向关心长期分析，是战后不发达国家工业化问题迫使经济学家重视经济成长研究的结果。经济成长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尝试正确测定经济成长，从而又促使分析由质向量的转变，数量研究便相应发展起来。

在库兹涅茨带动下，这种研究在国际范围取得了显著进展。除《收入与财富》丛书收入的论文外，主要有三项成果，一是英国迪恩和科尔的《1688—1959 年英国经济成长》（1961 年），二是霍夫曼的《19 世纪中叶以后德国的经济成长》（1965 年），三是马尔采夫编的 12 卷《法国数量经济史》（1961 年）的出版。在日本，在国民核算体系基础上追踪明治以后经济发展而取得若干重要业绩，最引人注目的是刊行了以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为中心编制的《长

^① 参见速水融与宇泽弘文关于“美国的‘新经济史’与日本的‘新’经济史”的对话，载《现代经济季刊》，1982 年春季 47 号；以及速水融自撰年谱：《从德川社会的展望》（非卖品），同文馆，1989 年。

期经济统计》13卷。

此外，在法国率先将数量方法运用于物价史、工资史研究的弗朗索瓦·西米安德，利用统计方法将各种现象之间的数量关系导入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从而建立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经验方法。西米安德的研究对以后物价史研究的重大影响，在于把货币数量变动看作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因，据此而把经济史分成以物价腾贵和生产增长为特征的繁荣期，与以物价低落和生产减少为特征的停滞期相互交替来把握。拉布劳斯进而发展了西米安德的方法，以统计数据为依据，以曲线来表现经济事实。他在对18世纪法国物价、工资、地租等收入的趋势、循环变动及季节变动所进行的分析中，利用移动平均法计算出趋势的值，替代在现实小麦价格曲线上呈现的四大周期，并对各种物价和收入趋势进行比较。拉布劳斯探讨了前工业化社会的萧条机制，指出织物工业的生产量与谷物价格的短期变动经常呈逆相关，据此推论在农业占支配地位的经济中，与工业化经济不同，经济萧条由农作物歉收、谷价暴涨开始，收成状况恶化降低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而谷物价格高涨在家庭开支中食物所占比例增大，又导致对工业品购买力下降。这样谷物价格暴涨与工业部门生产低下纠结在一起，使萧条波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在物价史研究中，汉密尔顿就欧洲价格革命对工业发展的有效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在美洲贵金属流入的影响下，16世纪欧洲发生的长期物价暴涨是与工资上升滞后相伴出现，此外地租也同样由于制度僵硬而上升迟缓。结果工业产品价格与成本的差距扩大，由此形成的剩余超过了预期，致使资本积累变得容易。汉密尔顿认为，18世纪的产业革命在某种意义上